

士·娼·優—— 晚清上海社會生活一瞥

• 許 敏

上海開埠之初，社會文化生活並不十分活躍，所謂「文物寂寂」。租界內，由於華洋隔離，生活比較單調、乏味。而舊縣城裏，雖然商業已經很興盛，社會風氣卻較敦厚質樸、崇尚勤儉，在整個江南地區瀰漫的美人名士、文酒流連的奢靡氣氛中是個例外。眾所稱道的「滬城八景」：海天旭日、黃浦秋濤、龍華晚鐘、吳淞煙雨、石梁夜月、野渡蒼葭、鳳樓遠眺、江皋雪霽，體現的主要是自然情趣，而較少絢麗的人文色彩。儘管明清之際的松江府物產豐饒、人文繁勝，是江南文化的集萃地之一，但滬邑則更呈現出濱海縣城的色調，其民風「氣質剛勁，舉止率鹵」^①。

太平天國起義攻佔江南，江南的「衣冠右族」和大量難民湧入上海。大批華人避居租界，打破了華洋分居的狀況，使租界內的社會生活開始活躍。江浙官紳攜帶大量錢財流寓滬上，使上海迅速聚集了開發的資金。據租界當局不完全的統計，1860—1862年，至少有價值650萬兩銀元的華人資本進入上海^②，這對上海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。租界的房地產業因之勃興，推動了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；前所未有的開發規模和速度，使上海的面貌大大改觀。同時，上海的生活質量也開始改變。以前上海商業中比較冷門的奢侈品，如古董、首飾、珍寶、皮貨等行業，從此興隆，爾後一直居全國之冠。飲食、娼妓、戲園等中國傳統消費城市中最為發達的「第三產業」也在上海昌盛起來。

十九世紀60年代起，上海滬北這個原來偏僻荒蕪的「彈丸蕞爾之地」，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轉變。江南名士王韜1848年到上海時，十分鄙視該地，認為這裏「風俗鄙陋」，「海氛甚惡，非可久居」，「讀書子弟也皆俗氛滿面，絕無深識遠慮可與談者」^③。但當他再度來上海，不得不驚嘆「燈火輝耀，笙歌騰浦」，「鈿車駢溢，飛塵散香」，江南奢華鋪張的生活方式幾乎變本加厲地在上海展示。上海人鮮衣炫服起來，市面也變得燈紅酒綠熱鬧非凡，「舞榭歌樓，戲園酒肆，爭奇鬥勝，生面獨開」^④。過去蘇州、揚州的繁華夢，竟在上海延續了下來。

中國的士大夫是社會文化中最活躍的因素，「在本朝則美政，在下位則美俗」，士風對社會風俗有重大的影響。晚清最早進入上海的文人學士絕大部分來自江南。顯而易見晚清上海的社會風貌中，深深印染了明清江南文化的獨特色彩。

太平天國起義攻佔江南，江浙官紳攜帶大量錢財流寓滬上，據不完全的統計，1860—1862年，至少有650萬兩銀元的華人資本進入上海，這對上海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。

一 江南文人在上海商業社會中遭到冷遇

明清時代的江南是當時中國學術文化最發達的地區，江南學風興盛，士大夫人數眾多，在社會上形成了很大的勢力。由於江南讀書人太多，能夠通過科舉進士的名額又太少，這種情況對江南的讀書人造成了極大的壓力。為了緩解這種壓力，江南士林在科舉之外另闢一條獲得聲譽的途徑，以撫慰眾多的學士文人。士林通過遊學、結社、互相品評，重新建立一套估價每個人學問、才情的標準。這種標準掌握在公認的士林領袖那裏，憑碩學鴻儒之輩的口碑，「後生一經品題，便作佳士」^⑤。這種品題，因為沒有程式化的考試形式，更重視個人的才華，所以深受江南士林的歡迎，轉瞬便形成風氣。「一時文章，大都騁才華，矜識見，議論以新闢為奇，文詞以曲麗為美」^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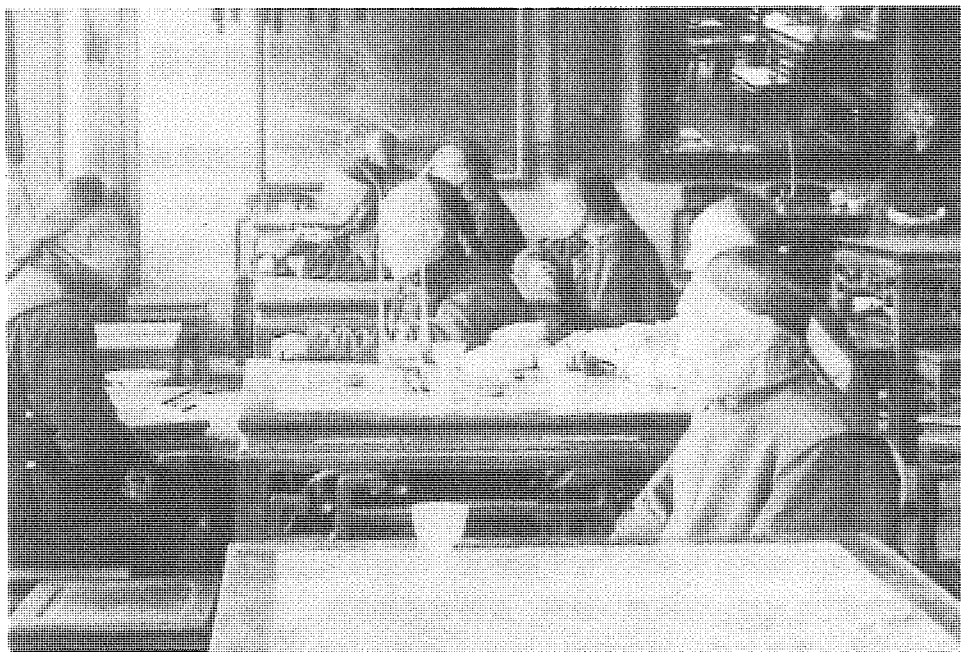
這樣的士風對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江南民間寵愛才子名士，容忍和放任他們的狂放言行。在蘇州、揚州、金陵等通都大邑，商賈富豪多以交結、款待才子名士擴大聲望、博取榮譽。如此，讀書人的名利由民間負擔了一部分。文人學士儼然像社交明星那樣出現在秦樓楚館等社交場所。

明清江南社會特別推崇才子，文人學士也靠驚世駭俗的言行來譁眾取寵。江南士子其實是被排斥在政治中心之外的失意一群，他們憂患地注視着遙遠的京城的政治風雲變幻，卻對這些變化無可奈何。於是，他們只能實行另外一套生活方式。

其實，晚清從江南逃到上海的士大夫，初到上海時感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。平日號稱經濟文章，只嘆「誰將吾策用」，但當太平軍攻城時，他們卻束手無策，甚至臨危「一死報君恩」也不願，這於臉面是非常難堪的。而且，上海社會貿易發達，無論商賈平民都勤奮於事，非常務實，士林盛行的那一套高談闊論的東西，在社會上根本沒有人理睬。王韜的《瀛壖雜誌》中記錄了當時許多因南京、蘇州等地被太平軍攻佔而「避跡滬上」的文人士子，雖「皆意氣激昂，高自期許，慨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」，「酒酣耳熱」之際在茶樓中「擊劍談兵」，但有誰還信任被農民起義軍打得一路逃竄的書生呢？這批人「惜以時無用之者，咸鬱鬱不得志」。官紳逃難還能攜帶萬貫家產，一般的書生身無分文，流落上海街頭，其窘況可知。江南名士王韜以「窶士」自稱，「貧逃酒國」。蔣敦復則「天寒猶着單布袍」^⑦。餘姚周白山，「坐是奇窮，丐食滬濱，僦西園一弓地，效君平垂帘設卜肆，卒無顧而問者」^⑧。太倉人宋小坡，在上海「奇窮日甚，餽粥幾至不給」^⑨。

至於江南的妓女，是在太平天國期間流入上海的。「庚、辛之變，江浙淪陷，士女自四方至者甚多，遂為北里巨觀」^⑩。初時，士與娼在上海並沒有像原來那樣風流相尚。離亂之際，謀生為上，窮書生絕不是妓院樂意接納的對象。其時往來於妓院的，是一些有錢的大商人。「閩、粵大腹賈擁厚資者，遨遊其間，意有所屬，輒張夜宴，斗酒藏鈞，樂無逾此。纏頭一擲，動費不資」^⑪。另外最肯散財的，是靠戰亂中搶劫擄掠致富的清朝官兵。湘軍名將郭松林來到上海後，號稱家資數百萬，驕奢淫逸，飛揚跋扈。「曾偽為丐者，手

上海社會非常務實，士林盛行的高談闊論，在社會根本上沒有人理睬。初時，士與娼在上海並沒有像原來那樣風流相尚。



清末的上海茶館，是昔日落魄文人抒懷暢議的聚集地。

攜粗紙，至各娼寮分送，多有呵叱者。及撿粗紙，則中藏金葉，人目為活財神」^⑫。如此闊綽的場面，怎不令妓家為之折腰。故那時上海「妓家大半在西城營丁錯處」^⑬。妓女嫁給發戰亂之財的軍人武夫者甚多，但這些官兵的粗俗無知又使許多人在婚後不堪忍受，於是逃離家庭重操舊業的事情時有發生。到後來不少妓女專找軍官「湔浴」，假稱與其結婚，待席捲財產後即潛逃。

阮囊羞澀的士子無力問津妓院，只能買醉於價廉的酒肆茶寮。開埠初期，上海茶樓之盛遠甚於餐館。這些名士狂生心中雖有鴻鵠之志，可是卻在上海閒來無事，謀生無技，一副淪落相。與上海灘頤指氣使的軍官、商賈相比，書生們的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打擊。他們不禁哀嘆：「死能埋我何妨醉，生不如人未敢狂。」^⑭這些人迫不及待地要表現自己，到處給人出謀劃策，以求獲得別人的重用和尊敬。連馮桂芬這樣當年中過榜眼、點過翰林、做過京官的江南文壇領袖，逃難到上海後竟願意屈就於吳熙這個地方道台的幕府。更典型者如王韜，到處上書呈獻計謀，他自編的《弢園尺牘》據稱只選了上書的十分之一不到，那已經是連篇累牘了。他甚至同時向清政府和敵對的太平軍呈獻破敵之計，頗像那個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的賣兵器者。結果，啟用這批書生的，既不是清政府，也不是太平天國，而是上海租界裏的傳教士。在墨海書館、《萬國公報》、江南製造局譯書館，為了洋人首先給予他們的禮遇，也為了能靠自己的薄技謀食，這些潦倒上海的書生拋卻了夷夏大防的嫌隙，逐漸變成了晚清上海華人的第一批職業文人，變成了同其他職業者一樣的城市市民。

名士狂生心中雖有鴻鵠之志，可是卻在上海閒來無事，謀生無技，一副淪落相。

二 文人掌握了輿論工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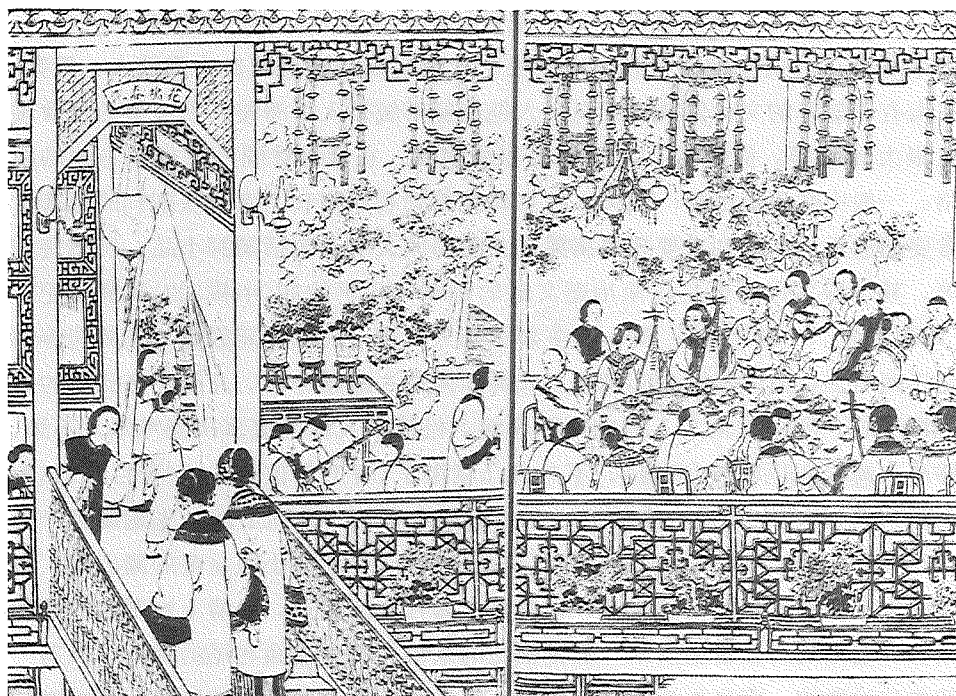
晚清上海，西方文化的輸入、傳播工作主要是由傳教士擔任的，在這一特殊契機下，傳教士薦引給中國文人的近代文化事業，首先是設文化傳播媒介機

構。上海的書局、報館匯聚了許多來自江南的文化人。他們開始衣食於洋人，後來逐漸自己獨立創辦報刊、出版社，有些則成為職業的自由撰稿人。畢竟，江南有着深厚的文化傳統，江南文人把這種傳統帶入上海後，對這裏的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。從晚清上海的中文報紙來看，它就有着同外文報紙不同的風格。一般中文報紙都有一個文人氣息較濃的副刊和增刊，而這些副刊的影響常常要超過正刊。副刊主要刊登寓滬文人的消閒文章，包括詩詞小品、尺牘遊記等，其中很多內容就是江南冶遊文章的延續。較早的如《申報》的「瀛寰瑣記」、「四溟瑣記」、「寰宇瑣記」等，其主要撰稿人王韜、俞樾、蔣敦復、葛其龍等都是江南名士。這些報紙副刊實際上成為江南文人顯露才情、互相唱和品評的另一種形式，所以江南文人對此極感興趣。松江文人韓邦慶多次應考舉人不第，移居上海，先供職於《申報》，不久自己創辦了《海上奇書》，以刊載自己的《海上花列傳》為主。武進人李伯元，也是因累舉不第，跑到上海，先創辦了一份《指南報》，後又創辦了《遊戲報》和《繁華報》，成為上海小報重要的開山祖。由江南文人倡導的這類消閒報刊，很快為上海社會所接受。晚清上海眾多的消閒報刊，逐漸成為社會生活中一種更廣泛的茶館閒聊和街頭巷尾的議論，成為一種非政治性的、市民生活的話題形式。晚清上海文人參與並控制報刊這類形式的「民間輿論」，也使士與娼的傳統關係得以恢復。

比起過去江南的城市來，晚清上海聚集的人數更多，社會流通量更大，而那種較穩定的遊手好閒階層卻大大地萎縮了。作為娼妓，過去那種靠相對固定的客人即能維持生意的日子已經日益消逝。在這近代商業城市中，妓女像其他商品一樣，必須靠廣告來推銷自己，同士結交、在報刊中被議論，成為最有效的出名途徑。掌握着大眾傳播媒介的文人重新贏得了妓女的青睞，甚至成為青樓中的吃白食者。而「停車訪艷，載酒看花」的醉生夢死，也使失意的讀書人產生一種重新受到社會寵愛的感覺。出於各自的需要，士、娼鴛鴦重溫。晚清上海消閒報刊中捧妓文章一時大盛，蓋緣於此。「評花品葉，鼓吹風雅，始有小報」^⑤。自稱為「風月文章」的王韜非常感慨江南妓女到上海後變得「大都銅臭熏人」。因此他在文章中竭力表彰那種「每遇文人才士，極相憐愛，周旋酬應，出自至誠，從不瑣瑣較錢幣」^⑥的妓女風範，字裏行間充滿了江南文人在上海社會遭受挫折後又迂又酸的心態。

儘管「江南好，風景舊曾諳」，但小上海難以阻擋地替代、超過了大江南。繼秦淮風月、揚州畫舫之後，滬上「妓院亦甲於天下，別戶分門，不勝枚舉」^⑦，「珠帘十里，風月樓台，亦不減秦淮水榭。西城一帶，曲巷幽深，妓家鱗次。每當西墜時，箏笛聲悠揚四起，隔帘花影，弄姿逞媚，到處路迷，入夜尤甚。遊其地者，無論烏衣子弟，巨腹胡商，蓋靡不魂迷色陣，一擲千金」^⑧。有意思的是，一部較早的江南狹邪小說《風月夢》，原刊於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左右，書中所敘為揚州才子與妓女的糾葛。晚清上海有人將此書改頭換面，書中場景由揚州變為上海，人物稍稍易服換姓，但文辭和故事情節依舊，題作《名妓爭風》(又名《海上花魁影》)，結果在上海風行一時蓋過原作。由於晚清上海文人和妓女多來自江南，風月場上崇尚吳儂軟語，以至《海上花列傳》、《九尾魚》等著名的冶遊題材小說，非用吳語不能傳達其時特有的氛圍。

晚清上海的中文報紙副刊，主要刊登寓滬文人的消閒文章。而這些報紙副刊，實際上成為江南文人顯露才情、互相唱和品評的一種形式。文人參與並控制報刊這類形式的「民間輿論」，也使士與娼的傳統關係得以恢復。出於各自的需要，士、娼鴛鴦重溫。



妓女的社會地位雖然不高，但在晚清的民間社交活動中，卻發揮極其重要的功能。

三 品花捧角，江南文人改變了上海的人文環境

晚清上海文人盛行給妓女評品、開花榜，這原是流行於江南的風氣。順治十三年(1656)秋，「松江沈某至蘇，欲定花榜，與下堡金又文招致蘇松名姝五十餘人，選虎邱梅花樓為花場，品定高下，以朱雲為狀元，錢瑞為榜眼，余華為探花，某某等為二十八宿，彩旗錦幟，自胥門迎至虎邱，畫舫蘭橈，傾城游宴」^①。同治中葉，就有人在上海開花榜^②，然後蔚然成風。1897年夏，上海《遊戲報》開創了在報紙上開花榜的先例，把這一活動推向民間，變成市民關注、參與的一項社會選美娛樂。揭曉當天，市民奔走相告，街頭巷尾爭購《遊戲報》。報館僱鼓樂隊送匾至入榜妓女門上。「一經品題，聲價百倍，其不得列於榜者，輒引以為憾」^③。因有如此顯著的廣告效應，妓女無不爭與名士相交，福州路便成為士與娼共同的聖地。由於報章逐日報導名妓的趣聞、近況，無意中把她們造就成了社會新聞人物、社會明星，一般民間的社交活動都會有人攜妓參加以為標幟。那時上海的妓院本身就是一個社交場所且不去說它，在其他重要的民間社交場所，無不有妓女介入，「每於夕陽西下，高車快馬，徜徉於張園、愚園等處，夏令之夜花園，尤為若輩顯艷地」^④。在晚清上海，妓女實際上是第一批在社會上自謀生存的「打工女郎」，當時能在社會上拋頭露面的女子也只有她們，所以，妓女自然地要承擔社會所需要的公共關係的責任。晚清上海能成為名妓的，不單靠其相貌等審美方面的優勢，且更靠其與社會交往的能力。所謂「第一要講究資格，第二就是講究應酬。那『色藝』兩字竟可以不講的了」^⑤。這也是由於晚清是上海近代城市社會剛剛形成的時期，社會生活還處於比較粗鄙的階段，兼容性較大，隨着整個近代城市生活各方面的逐步展

1897年夏，上海《遊戲報》開創了在報紙上開花榜的先例。揭曉當天，市民奔走相告，報館僱鼓樂隊送匾至入榜妓女門上，無意中把她們造就成了社會新聞人物、社會明星。妓女實際上是第一批自謀生存的「打工女郎」。

開，它將日益朝更加專門化、細節化的方向發展。早期妓女的各種社會功能也會被逐漸分解和專門化。

晚清上海，同青樓繁盛齊名的是梨園。滬上「梨園之盛，甲於天下，纏頭一曲，最足銷魂」^{②4}。清末上海文人有「滬北十景」引為自豪，曰：桂園觀劇、新樓選饌、雲閣嘗煙、醉樂飲酒、松風品茶、桂馨訪美、層臺聽書、飛車擁麗、夜市燃燈、浦灘步月。同以前的「滬城八景」相比，「滬北十景」的人文色彩就明顯地豐富了，這也體現了開埠以後上海社會文化的變化。「桂園觀劇」列為「十景」之首，可見看戲這一活動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。每當上燈時分，各戲園門前車馬紛來，綺羅雲集，名流豪客招妓同觀成為清末上海戲園的常規，這雖是沿襲江南舊例，但在上海尤其著名。

優與娼原來是一回事，都是專擅音樂歌舞，由宮庭教坊司管理。以後娼逐漸成為女妓的專用名詞，而優也多指男性藝人。清朝在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以後，宮庭教坊徹底廢止女樂，以太監替代，康熙時各省也廢除官妓^{②5}，於是清朝政府名義上已不再供養娼與優。教坊的娼、優多散失於民間，因此民間仍存在着大量娛情聲色的娼和優，其中尤以江南為甚。康熙南巡和乾隆六下江南，江南的地方官員、商紳大事鋪張迎駕，調集了各地戲班薈萃於江南，特別是乾隆駐蹕的揚州，集中了大量色藝俱佳的優伶。這裏戲曲演出頻繁，水平很高。乾隆返京後，十分懷念在江南看到的戲曲，於是召南伶入京供奉。其後各朝皇帝都有看戲的嗜好，不斷有優伶「內庭供奉」。

上海的營業性戲園創始於1850年左右。1856年以後，戲園北移進入租界，最早進入上海戲園演出的是來自浙東、蘇州的昆曲班子，以及來自揚州的徽班。1867年，開設於法租界石路的滿庭芳戲園首先搬來了京戲班子，結果戲園為之爆滿。於是，其他戲園紛紛仿效，爭相聘請京戲班子來滬演出。上海從此成為京戲的一個重鎮，而且上海特有的審美情趣改造了京戲，上海的徽班與京班合流演成新派，開創了南派京戲的路子。晚清上海所謂「梨園甲天下」，蓋指京戲，號稱清末上海四大京班的丹桂、金桂、天仙、大觀等戲園是其代表。上海人赴戲園，真所謂「看戲」。它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娛樂，還是一種社會交往：不僅僅看演員表演，還要看自己出鋒頭。戲園是看客們爭奢誇豪、揮金如土的又一炫耀場所。「只一戲館，而一日一夜，費至數千金」，「誠不夜之芳城，銷金之巨窟也」^{②6}。上海的戲曲演出活動，從清末開始逐漸同整個城市的社會生活聯繫在一起，成為城市市民生活方式的一種體現和重要組成部分^{②7}。

在江南士風中，文人學士的品曲、品劇、品優有着比品妓更悠久的傳統。這種「文人氣」也帶入了晚清上海，在上海的消閒報刊中，捧角是捧妓之外的又一個熱點。報刊的大肆鼓吹，對上海的梨園盛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士與優的關係也保持得相當密切。儘管有些在京城被寵慣了的「京朝名角」，初到上海不習慣上海報章的議論方式，曾發生過數起演員打鬧到報館的事情，但後來他們也都適應、屈就了上海人的時好。

娼與優原來在社會上並不公開交往，清朝「京師之伶不敢謁妓，卒然過之，必屈一膝以致敬，稱之曰姑姑，妓則貽以手巾、荷包等事」^{②8}。他們之間的來往一般只限於私下。但在晚清的上海，就沒有這樣的忌諱。初時，娼與優的來

上海人赴戲園看戲，不僅僅是為了藝術娛樂，還為了社會交往；不僅僅看演員表演，還要看自己出鋒頭。戲園是看客們爭奢誇豪、揮金如土的炫耀場所。

往還不是十分張揚，因為沒有受到社會的壓力，這種交往就變得公開而頻繁。除了在戲園或者妓家，優與娼還時常攜手在茶樓酒肆中聚宴、談笑。這種現象意味着在晚清上海這樣的城市裏，商業原則正在改變和替代傳統的貴賤、雅俗等級。娼、優在上海不再是被排斥於社會良民之外的賤類，而是能夠按照一般市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平民。

四 娼、優成為一般市民社會生活的示範

上海是一個移民的城市，缺乏一個共同的、完整的社會文化背景，而城市生活的逐步完善，又會十分自然地需要並形成一種大眾流行的市民文化趨向。在近代上海城市剛剛形成的階段，最早活躍於城市文化傳播媒介領域的江南人士，首先將江南的社會風氣和文化傳布到上海社會，改變了原來的「野而無文」狀況，對以後上海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魯迅先生在論述上海文藝的發展中，就談到了「才子」的影響^②。

有研究者指出，近代上海是個商業發達的城市，一般人生活富裕而怡適，沒有濃烈的政治熱情和宗教狂熱^③。因此，在平庸的閒暇生活中，市民們非常盼望有種傳奇性的、刺激性的東西出現，就算沒有，也要製造它。娼、優的社會明星地位，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正是市民製造出來的。所以，就這一點而言，娼、優（包括士）並不是一般的普通市民，他們享有犯忌、僭越的特權。市民們所渴望的戲劇性生活，便由他們充當代表、充當演員在社會上展示。而一般市民則通過觀賞、評論的方式來參與，這樣，既可以在感覺上成為冒險生活的一部分，又不必承受突破常規所帶來的麻煩。

娼、優是晚清上海社會生活中的「特權階層」，他們不僅可以破例，而且也可以開例。出門坐轎原是官場的禮儀，而在上海則是妓女的排場。漱六山房的《九尾魚》第十五回中寫了一樁趣事：常州土財主金漢泉心血來潮跑到上海來逛堂子，看到妓女所乘的轎子十分華麗，硬要借去坐着到馬路上兜風，結果遭人嗤笑，被罵作「曲辮子」。清末上海京劇舞臺上出現坤角，最早登臺的女演員有不少是擅長京戲的妓女，名妓林黛玉亦是晚清上海聲譽卓著的京戲坤角。娼、優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晚清上海社會生活的一種示範^④：

洋涇濱一隅，五方雜處，服色隨時更易。自京班來滬，一時官商士庶強半京裝。其甚者，男則寬衣大袖學優伶，女則靚妝倩服效妓家。相習成風，恬不為怪。上海初不知二黃調，今則市井兒童亦能信口成腔。風氣移入，一至於此。

妓女是掌握酒事觴政的，當時上海的飯局酒宴的規矩、排場多要依靠妓女來指派，而她們的口味、喜好，對各幫菜餚的興盛、改革關係不小。

娼、優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自由戀愛、同居，市民們慫恿着他們之間的「風流」生活。在社會新聞中，幾乎每天都有關於娼與優姘居、糾葛的消息，幾

上海市民通過觀賞、評論的方式來參與娼優的生活，這樣，既可以在感覺上成為冒險生活的一部分，又不必承受突破常規所帶來的麻煩。

乎所有上海名妓、名優都曾陷於那種「風流官司」裏^②。關於這類消息的大量報導，其實顯示了清末上海社會中婚姻關係正在發生變化。晚清上海社會新聞中所報導的眾多的「風流事」，其社會意義和影響，是可以專門進行探討的問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娼與優的「犯忌」特權是有一定限度的，當優伶與一般平民產生戀愛、婚姻關係時，每每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。晚清上海有許多著名的訴訟案，如李春來案、楊月樓案，都是涉及優與平民女子的戀愛、婚姻。優伶都被指控為騙姦、謀財，最後因此被治罪。但同時，優與平民女子的婚姻也逐漸得到了社會輿論的同情，尤其是一些案件的經過在報刊上披露後，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並引起爭論^③，《申報》等許多有影響的報紙都發表了不少公允的意見。也許，當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及生活方式發生變化，亦必然會影響到觀念形態的轉變。

註釋

- ①③ 王韜：《瀛壖雜誌》，卷一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。
- ② Lanning and Gouling: *A History of Shanghai* (Shanghai, 1923), p. 26.
- ④②④ 黃式權：《淞南夢影錄》，卷一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。
- ⑤⑥ 葉夢珠：《閩世編》，卷二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）。
- ⑦ 于醒民：《上海，1862年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417-20。
- ⑧⑨ 王韜：《瀛壖雜誌》，卷四、卷五。
- ⑩ 陳伯熙：《老上海·妓院沿革考略》（上海泰東圖書館，1924）。
- ⑪⑱⑳㉑ 徐珂：《清稗類鈔·娼妓類》（中華書局，1986），頁5161；5149-50；5149；5155。
- ⑫ 李伯元：《南亭筆記》，卷七（上海書店，1983）。
- ⑬ 楊光輔：《淞南樂府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76。
- ⑭ 王韜：《瀛壖雜誌》，卷五。
- ⑮ 陳伯熙：《老上海·小報之原始》。
- ⑯ 王韜：《淞隱漫錄》，卷二（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3）。
- ⑰ 池志微：《滬游夢影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63。
- ⑱ 毛祥麟：《墨餘錄》，卷七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）。
- ⑳ 孫國群：《舊上海娼妓秘史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71。
- ㉑ 陳伯熙：《老上海·妓女習尚之今昔觀》。
- ㉒ 漱六山房：《九尾魚》，第十六回（荆楚書社，1989），頁119。
- ㉓ 王書奴：《中國娼妓史》（上海三聯書店，1988），頁261。
- ㉔ 黃式權：《淞南夢影錄》，卷二。
- ㉕ 詳見許敏：〈各地戲曲薈萃一地〉和〈新劇應時而起因時而衰〉，《近代上海城市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0）。
- ㉖ 魯迅：〈上海文藝之一瞥〉，《二心集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）。
- ㉗ 李天綱：〈海派——近代市民文化之濫觴〉，《近代上海城市研究》，頁1146。
- ㉘ 葛元熙：《滬游雜記》，卷二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。
- ㉙ 參見陳伯熙：《老上海·娼優聯合表》。
- ㉚ 參見尚非：〈楊月樓風流案〉，《舊上海社會百態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1）。

許敏 1961年生，198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，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。